

人间天窗

■任剑(河北)

不是所有画家都喜欢画窗,比如文森特·梵高。要么仰望星空,要么头顶烈日,回到室内的他再也不想看外面的世界哪怕一眼。在巴黎近郊30公里的瓦兹河右岸的奥维尔小镇,梵高在这里走下了人生的站台。《卧室》中一扇窗给他带去了最后的温暖。黑色的窗框十分突兀,近乎不协调的方式来提醒它的存在,标志性的金黄色玻璃,如同其作品《读书的女人》手中那个别有用心的黄皮书,某种心理学象征,寓意着生命的渴望以及肆意忘我的自由,是梵高留给世界最深刻的印象。

想到窗,便想到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在《窗边读书的女子》中,一扇窗给恬淡、慵懒的生活带来光亮。窗下清风,手中的情书读着孤单的自己,一种爱而不得,一种忘而不舍。一扇窗勾连了此刻与远方,含而不露、欲罢还休……现实与理想在窗前相遇化成了永恒。

巴尔蒂斯(Balthus)喜欢画窗,窗让室内的一切都变成了隐私。作品《窗前的少女》描绘了一个平常少女窗前的背影,一扇窗隔着屋内与屋外,连着世俗烟火与风雅清欢有形的窗挡不住春光,无形的窗却阻隔了世界。而最爱画窗是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透过一扇扇的窗去窥探寂寞。窗内孤独的人,窗外陌生的城,现实与明天一墙之隔,不知哪一个更真实,理想之光照进现实的窗口却带来了内心的绝望。心中虚幻的梦,卑微又倔强的自我,无法逃脱的欲念与烦躁。窗子间隔了所有人,把万家灯火变成了孤单。

艺术家分两种,一种用幸福去表现苦难,一种用苦难去表现苦难,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同样的苦难意识,培根是那个更“可怕的人”,他将痛苦、幻灭、紧张与恐惧化作崇高的“扭曲”,以此提



梵高 卧室 1888年



巴尔蒂斯 窗前的少女 1955年

醒人们忘却的记忆。巨大的平面背景,几何式的分割,符号化抽象意义的黑色方块,切割了时间与空间,神圣之窗通向不可知的哲学想象。此刻,“窗”不代表光明,如巨大的黑洞,吞噬着怪兽般残缺的肢体。

《坐在窗边的特蕾莎》不同于巴勃罗·毕加索以往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作品夸张、戏谑的风格,优雅的特蕾莎坐在窗前,高耸前额的金发缪斯,散发着古典主义的光。画中人物与环境分别采用弧线和直线的几何化构成,对比强烈的高纯度色彩独立分布,协调与柔和。窗前的特蕾莎让毕加索无暇顾及窗外的风景,绿色窗子里只有柔和的光,而她也并不为窗外春光所动,唯有毕加索才是她心中的波澜。所谓是:“一窗一世界,一路一风尘,一见倾心动,一念走半生。”情感上始终处于“桃色时期”的毕加索并未与特蕾莎走下去,他

的眼中始终不止窗前这一处亮光。

再来看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的作品,精微细致的宾州田园风光,透露出浓浓的诗意与淡淡的忧伤。其《克里丝蒂娜的世界》影响了中国的伤痕美术以及乡土艺术,并刮起了“怀斯风”……透过他房间的窗远远望去,克里斯蒂娜爬过的草地,温和、空旷、孤寂,就这样有了《海风》。具象的窗子在画面中形成了一个抽象的平面结构,典型的文学性与象征意义,这是怀斯对于写实独特的理解。一扇窗将时间定格成一刹那,风如歌,追忆着过去,把静寂变成了情思。怀念着故乡,一种令人神往的力量。

同样令人神往的还有从户外看室内的视角。在布鲁塞尔约萨帕特公园附近一条宁静漆黑的街道旁,夜色下一扇亮着昏黄灯光的窗,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时天

空却如白昼般蔚蓝,这种科幻电影般的神秘画面来自马格利特(Magritte)的《光之帝国》。受法国评论家布勒东“但愿太阳今晚出来”诗句的灵感启发,马格利特不可思议的组合了黑夜与白昼,一个巨大能量的日月同辉式的“虚假的现实”。黑色的树遮挡了黑色的楼,只露出一扇完整的窗。窗内的灯自顾认真地亮着,透过昏黄的灯光映出如十字架般诡异、神圣的窗棂。这一定不是艺术家的偶然,超现实画家最擅长用隐喻和象征手法将潜意识及梦境与现实进行矛盾的组合,更加主观、抽象、严肃的真实。

其实绘画从未真正的改变,只是我们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一扇窗如一本书,写满了命运与归宿。如果某一天,你能同时看到阳光、日落、繁星,并品味出其中的甜蜜与幸福,那便是你找到了人间的天窗。

缘缘堂荟萃名家笔墨

■周惠斌(安徽)

“缘缘堂”是著名书画家、文学家丰子恺先生一度栖身的生活乐土,也是他放飞文学和艺术才思的精神家园。1926年,丰子恺寓居上海江湾,适逢早年就读师范时候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途经沪上,于是请恩师写下氤氲佛家气息的“缘缘堂”三字,装裱后悬挂在寓所内,凸显了师生两人共同的佛性文心。

丰子恺于1898年出生在浙江桐乡石门镇木场桥西梅纱弄。1932年,他用积攒的稿费,在自家祖居德德堂后面母亲留下的一处平地上,亲自设计绘画,建造了一栋坐北朝南、三开间两层楼建筑。第二年春竣工,耗资6000元,遂用“缘缘堂”命名。

缘缘堂被丰子恺视若理想的创作之所,“是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这里粉墙黛瓦、幽静雅致,陈设简洁朴素,大方实用,呈现出典型的江南民居风格。两层楼前的水泥地面大院子,南壁是一个半圆形花坛,种有樱桃、蔷薇、凤仙等花木,屋檐和墙上的爬山虎枝蔓垂挂;西南角有

一个扇形花坛,栽着一棵柳树,后改植芭蕉。这里春有满枝桃红,满堂燕语;夏有绿的芭蕉,红的樱桃;秋有熟透的葡萄,合奏的秋虫;冬有炭炉里的汤菜,火炉里的年糕,安逸温馨,岁月静好。楼后隔开一个院落是三间平房,再后面是一个小天井,有门通向后街。

缘缘堂堪称一座艺术宝库。底楼厅堂正中悬挂着马一浮题写的“缘缘堂”三字匾额,是用一块珍藏数十年的银杏板雕刻而成。堂额下面,中间挂着吴昌硕绘制的《梅花》中堂,老辣道劲;其两边,内侧是弘一法师书写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联“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外侧是主人自己书写的杜甫筑成草堂时表达欣喜之情的诗句“暂止飞鸟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东西两壁,则挂着弘一法师书写的《大智度论·十喻赞》一堂大屏。厅的东前间是起居室,壁上挂着沈曾植的书法和几幅古画;西前间是主人的书房,内置古琴,四壁皆图书,并挂有弘一法师手书《法华

经·普门品》集句长联“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以及丰子恺书写王安石的诗句“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1933年至1937年,丰子恺除间或往返沪杭等地,有将近5年的时间蛰居在缘缘堂专事著译,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近20部作品。他对缘缘堂情有独钟,数度撰文述及,更将自己的文章连续以“缘缘堂”的名义结集出版,《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1937年末,缘缘堂被日军炸毁,成为一片废墟,万余册古今藏书和大量字画化为灰烬。

1984年12月,其生前挚友、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主席广洽法师慷慨捐资,在原址按原貌重建缘缘堂,前后布局、内外结构、室内陈设,悉依当年样式。东面围墙上5个红底黑字“丰子恺故居”,由陈从周题写。墙门内侧上方“欣及旧栖”4个阳文大字,根据丰子恺当年的题书仿制,意指既建新屋亦不

忘旧舍,显示了主人感恩和传承的情怀、担当。前院西壁上的“缘缘堂”额、正屋后门口“丰子恺故居”,由李可染题写。正厅门楣上“丰子恺故居”匾,由叶圣陶书写。厅中的“缘缘堂”额,根据马一浮原迹复制;中堂《红梅》画轴,是唐云仿吴昌硕画意创作而成;两旁悬挂的两副对联,已改为仿制板联。正厅西室布置了丰子恺半身铜像,东室除陈列丰子恺的书画外,墙上正中位置悬挂着一幅丰子恺全身水墨画,以及当代多位书画家题赠的作品。楼上三间分别以板壁隔成前后两室,如今皆陈列着其在各个时期的著作、译作、手稿、照片、信札、印章,包括其他遗物约500余件。

缘缘堂风雨百年,建构之初,书写了丰子恺热切饱满的文人理想和家园情怀,然而它命运多舛,生逢乱世,毁于兵燹。半个世纪后,缘缘堂历经复建,朱栏粉墙,青砖黑瓦;书画满堂、人文勃兴,再现了当年的历史风貌和内在神韵,更彰显了丰子恺彼时对诗意人生的憧憬和追寻……